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003，Suppl. XIV：1～10
Acta Botanica Yunnanica

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动态与展望

裴盛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对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简要综述。民族植物学自1896年在美国诞生以来，经历了百年漫长的发展过程。民族植物学由早期的描述编目有用植物，已经发展到了实验性、技术性和定量性研究的新阶段；民族植物学的原理与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社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近代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可归纳为3个特征：（1）研究方法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由记载编目和描述到实验性、技术性的定量研究和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的发展；（2）研究途径的发展表现在由调查记录、访谈式的被动研究到参与式研究和取证分析；（3）研究地区已由局部区域性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从对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扩展到所有不同文化背景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植物资源的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民族植物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在过去20年里已从无到有，建立起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内容、方法和途径，将民族植物学从基础描述性研究（调查、记载、编目），推进到应用研究，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农村发展和山区扶贫等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当前，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和新的挑战，必须紧跟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投入西部大开发，加强学科建设，推进研究与产业发展的结合，把民族植物学由地区性研究推进到全国性研究，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研究进展；发展趋势；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Q 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3－2700（2003）增刊XIV－0001－10

Ethnobotany：Development Dynamics of the Discipline and Prospects

PEI Sheng-J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s：This paper presents and discusses development advances and current trends of ethnobotany. Since ethnobotany appeared as a research subject in 1896 in USA，it has passed century development history. Ethnobotany has been developed in it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rom earlier documentation，description and inventory of useful plants，to a new stage of experimental，technical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 Today ethnobotan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plant resource，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advance of discipline in contemporary ethnobotany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that are：（1）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been shifted from recording

and description into experimental，technical and quantitative，and from basic research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2) Research approach has been dominated by participatory，case-studies oriented and analytical works rather than merely field survey，interviewing and passive recordings；(3) Geographical coverage of ethnobotanical studies has been expanded largely，from regional scale to worldwide ethnobotanical studies，in particular，ethnobotan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ained rapid development in last half century. Moreover，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ethnobotan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ractical research tool in plan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thnobotany as discipline to study with in China was begun in 1982，however its progress made in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is remarkable in establishment of theoretic frameworks；identification of research areas；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et-up appropriate approaches for basic and applied ethnobotany. Today，ethnobotany in China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basic，or descriptive research (investigation，documentation and inventory) into applied phase for plant resources and conservation，immens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plant resources，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entury，Chinese ethnobotany has to fac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ts development. It has to face the new conditions of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s West Provinces and promoting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to develop ethnobotany from the scale of regional research subject into national-wide scientific research subject；and to further accomplish the entir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ethnobotany，contribut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livelihood of rural people，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and consolidation of all ethnic nationalities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Ethnobotany；Development trend；Plant resource；Util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民族植物学从诞生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1896 年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J. W. Harshbegar）对民族植物学的最早定义为“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生态学的发展，生态学概念被引入民族植物学，将民族植物学重新定义为“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Ford，1978）。早期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美洲印地安人居住的地区，为西方工业国家从新大陆调查寻找植物资源，收集原住民族有关利用植物的知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民族植物学调查与研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植物原料，为研究开发植物新药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知识原型”，为农业革命提供过许多新的遗传育种材料和传统栽培品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到上一世纪中叶，全球植物资源总量逐年下降，森林砍伐，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流失，传统知识消失等问题日趋严重。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在此历史大背景下，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早期的调查记载传统利用的植物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源信息，逐渐转移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等研究领域。

民族植物学的跨学科性质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学科特征，其形成与发展，同植物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经典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从事民族民间利用植物的调查、记载、描述、编目工作，现代发展的趋势已将民族植物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定量分析、实验和应用实践的阶段，为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世界上 99％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包括遗传资源），95％的热带雨林和全部传统医药知识都直接掌握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手中，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正是他们利用、保护并发展了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他们是拥

有、使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主人，他们的智慧、权益和作用应当受到现代社会的尊重和保护。世界各地原住民在世代积累传承下来的民族植物学知识，对于急剧变化中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植物学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为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过多方面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为热带森林保护和农村社区资源可持续发展开创了卓有成效的方法和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1　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的三个特征

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896 年哈什伯杰公开发表民族植物学这一学科名词，是依据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和犹它州的若干考古发现，并将所发现的植物展示于 1896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1930 年世界上第一个民族植物学实验室（Ethnobotanical Laboratory）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成立（Ford，2001）。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发展与生态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上一世纪 30 年代以前，民族植物学完全是一个描述性的科学，主要从事调查记载当地植物的用途和归类编写各种有用植物名单的编目工作；到上一世纪中期之后，民族植物学的研究理论方法、途径和区域分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记载描述发展到研究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与评价，也就是说，现代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侧重点已经转移到人类和植物界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上（NSF，2003）。现将百年来民族植物学学科发展的特征归纳为以下 3 个方面：

1.1　研究方法新进展

由调查记载有用植物编目到实际应用于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研究方法新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调查研究的方法也由定性描述发展到定量和技术性、实验性。在过去的年代里，民族植物学曾经被认为是一种“从原住民中提取知识”的工作方法（Hamilton 等，2003），例如从民族药中寻找开发新药的线索和有关药用植物资源的当地知识；从民族民间传统利用植物的知识中获取资源开发的信息和天然产物的提取制备方法以及对当地植物区系中有用植物进行编目描述等。自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民族植物学工作转移到关注和研究探索现代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上（例如野生植物的过度采集、生物多样性的流失等）；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原住民和传统知识产权问题等（Posey & Dutfield，1996；Pei，2002；Martin，1995；Cunningham，2001；Cotton，1996；Hamilton 等，2003）。民族植物学家不仅为发现新的植物资源而受到鼓舞，而且更为关注资源植物的种群维护和物种多样性的保护问题。在研究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民族植物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室内工作方法，也由调查记载定性描述发展到实验性、技术性和定量研究。民族植物学正在由研究者从事观察，从信息报告员访问中获取信息的工作方法转变到实验生物学技术（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种群生物学、植物成分化学等）、生态学实验方法（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学、生态系统生物学等）；在技术手段上，已经发展到从分子测定到全球定位仪（GPS）的观测和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这些方法上的深入化使得民族植物学研究更加具有鲜明的综合特性，有助于民族植物学的学科进一步地创造性发展（NSF，2003）。

1.2 研究途径新发展

在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其研究途径也随之变得更加富于参与性和主动性。从事民族植物学工作的专业人员由被动的访谈、记录和资料整理变得更为主动性、探测性和分析性，各种形式的假设与验证方法在研究过程中被广泛采用；对研究结果的评价更加具有可比性、参照性和科学性。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知识的拥有者，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通常被设定为访谈对象或称之为“信息报告人（Informants）”，也不再是回答问题的被动的信息提供者，而是民族植物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的项目中，熟悉民间植物分类的村民不仅仅是采集标本问路的响导，而是发挥着“赤脚植物学家”和“民间植物分类学家（Para Taxonomists）”的作用；在民族药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民间草药医生、赤脚医生和药农不仅仅是采访对象，而是民族民间医药研究队伍的组成部分；在自然资源管理、社区发展和自然保护的项目中，社区各个类别的社会群体（妇女、农户、采集加工专业户、民间医生、工匠、农村商贩等等）都享有参与项目活动的平等权利，参加结构式和非结构式访谈、参与性制图、自由列举、各种有关植物利用和保护的问题以及参与式项目计划和参与式评估活动等等。民间传统的自然保护观念和途径逐渐受到重视，民族民间对各种自然圣境（神树、圣林、圣山、宗教林、图腾崇拜植物等等）的崇拜和保护，在经过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已经被科学界承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文化和信仰价值观，建议纳入现代自然保护区体系之中，作为自然保护区的文化信仰价值力量加以应用（UNESCO，2003）。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过去对民族民间传统自然信仰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排斥的态度，从而为广大社区民众积极参加到自然保护中来，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和无形的力量。民族植物学研究途径的这些发展与转变是世纪性和划时代的巨大变化。

1.3 研究地区由局部到全球的发展

早期的民族植物研究起始于北美洲，到上一世纪30年代，渐渐向中南美洲扩展，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北美和欧洲各大学里的植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Ford，2001），直到20世纪中后期，民族植物学工作才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及南太平洋地区发展起来。民族植物调查工作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Jain，1987），续后在墨西哥、巴西、尼泊尔、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越南、乌干达、坦桑尼亚、南非、埃塞俄比亚以及其它亚洲、非洲国家和南太平洋地区蓬勃发展起来（Hamilton等，2003）。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扩展另一个重要方向是研究社会群体，不仅限于原住民族、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而是扩展到对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这一发展使民族植物学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地区和社会群体。为推动民族植物学研究在植物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山地综合发展研究中心（ICIMOD）等，建立了若干跨地区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和交流国际项目，如“人与植物”行动计划、拉丁美洲-亚洲民族植物学交流计划、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应用民族植物学项目等。由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英国皇家（邱）植物园共同组织实施的“人与植物”行动计划（People and Plants Initiatives）成立于1992年（项目期限到2004年），该项目的目的是加强

能力建设（个人和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实践和发展；项目活动内容主要有：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植物学家，促进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组织各种类型的培训；资助定点研究项目；建立研究协作网络；协助民族植物学教学和人材培养；通过出版物传播应用民族植物学及其定点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到 2002 年已出版系列丛书 8 册、研究工作报告 10 本、人与植物手册 8 期、讨论文章 3 篇、声像材料 6 部，并建立了“人与植物”网站：http：//www.rbgkew.org.uk/peopleplants）。该项目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 10 多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实施中长期的应用民族植物学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并为项目结束后建立一个国际民族植物学机构（People-Plants International）做了充分的准备（Hamilton 等，2003）。

“人与植物”行动计划是民族植物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和里程碑。它不仅致力于推动民族植物学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实践的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和扶持了一些植物资源丰富、文化多样性程度高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基础，并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动了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发展。“人与植物”项目依据和遵循的学科思想方法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承认广大乡村群众不但拥有丰富的植物学、生态学及有关植物成分特性的丰富知识，而且依赖这些植物作为食物、药物、建筑材料和其它用途的来源；而这些有关当地生态系统的知识和本土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在消失；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野生植物的过度采集利用不断加剧，动植物栖息地正在迅速丧失，有必要保护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植物资源及其相关知识，为当地人的利益和其它地区人们今后能够利用这些资源作出贡献。

（2）传统植物资源管理方式的多样性和利用的广泛性，包括从栽培到野生采集的植物都包括在人与植物项目的研究计划范围之内。

（3）民族植物学家应该而且能够与当地群众一道，研究和记载植物资源的利用状况，识别野生植物过量采收等具体情况；找出可持续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采收方法并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法（如人工栽培）。

（4）人与植物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植物学家和当地群众一道就有关植物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项目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班（Workshop），组织关键成员参加学习研讨；派遣项目专家对野外定点研究项目提供现场指导帮助，提供相关文献资料（包括民族植物学、可持续发展、传统生态学知识等方面的资料），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植物学家在这一领域内开展工作，并通过建立网络（Network）的形式进行交流与合作。

2　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2.1　发展简史

民族植物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被介绍给我国读者。由本文作者发表的我国第一篇民族植物学文章《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发表于《热带植物研究论文集》（1982 年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盛诚桂先生撰文介绍民族植物学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刊于《植物杂志》1983 年第 1 期；1982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译人类学词汇》一书，同时不约而同地把英文 Ethnobotony 词条译为中文民族植物

学。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发展是建立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发掘中草药的群众运动，开展中药材资源普查，民族药调查等一系列多学科、专业队伍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广大科技人员上山下乡等运动，在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在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植物学应运而生，逐步发展起来。目前，民族植物学研究已遍及到多个省市自治区（大多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内容已从经典的调查编目描述性研究发展到应用性和定量方法研究，如在新药开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社区发展、自然保护、山区扶贫等方面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国外同行的重视。

民族植物学研究活动在我国最早起始于云南省西双版纳这一多民族聚居的热带森林地区。本文作者在多年从事植物学调查、采集、中国植物志编写、中草药普查、南药代用品研究、国产美登木抗癌研究等一系列科研工作中，逐步领悟到民族植物学的深刻学科内涵和研究方法，开始进行民族植物学的探索。在此过程中曾得到蔡希陶、吴征镒、俞德浚、陈封怀等著名植物学教授和美籍华裔植物学家哈佛大学胡秀英博士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以及美国民族植物学大师 Richard Evans Shultes，Peter Raven，Richard I. Ford，印度民族植物学大师 S. K. Jain，英国民族植物学家 Alan Hamilton，民族生物学家 D. A. Posey 等许多国际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

标志着我国民族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的成立。1987 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同年，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办了中国首届民族植物学培训班，邀请美国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民族植物学实验室主任福特教授（Richard I. Ford）主讲“民族植物学原理和研究方法”；本文作者主持并主讲“民族植物学在中国”；陈重明教授应邀主讲“本草学”。同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基金项目——《滇西北集市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得以起动。

1990 年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Ethnobiology）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的主题是：21 世纪民族生物学的挑战。参加会议的代表 370 余人，分别来自五大洲 37 个国家。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云南举办《亚洲地区民族植物学培训班》。在陈山（蒙古族）校长的指导下，1996 年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植物学研究所正式在呼和浩特市成立。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山地发展中心在昆明和西双版纳举办了《应用民族植物学培训班》。在 1990 年至 2001 年期间，与民族植物学相关的 10 多个国际会议和培训班相继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和新疆举行。这些国际性会议和培训班的举办，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生学位项目始建于 1987 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3 年后，建立了博士生培养项目；随后，中国药科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西南林学院、云南大学等高等院校相继建立起民族植物学研究生项目和高等教育培训课程。2001 年 8 月，首届中国民族植物学教材编写会议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召开，国内 7 所大学和研究所的民族植物学者参加了会议，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植物学教材编写工作即将完成，可望于 2004 年初交付出版。

199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将民族植物学学科列入基金指南，一批申报项目已获

准资助。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山地发展中心、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等国际组织先提供资助给国内十多个单位和上百人次，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培训和推广工作。国际关注我国的民族植物学事业发展，我国也对民族植物学的国际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近年来，我国民族植物学家帮助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不丹、蒙古、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进行人员培训、机构建设和项目指导，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和贡献，受到国际社会一致好评。

2002 年 10 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首届民族植物学学术与产业发展研讨会，是我国民族植物学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协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2.2 研究进展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借鉴和采用了美国通用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调查、记载、描述、编目等常规方法；80 年代中期开始结合采用美国东西方中心提出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为依据的农田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方法；80 年代后期，根据我国国情开始进行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和推广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民族植物研究从开始就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避免了许多走弯路的过程”（R. I. Ford 在 1987 年中国访问演讲时指出）。

在民族植物学的基本研究方面，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区域民族植物学、植物类群民族植物学和植物资源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上，如西双版纳竹类和棕榈藤类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滇西北集市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调查、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的研究等。

在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方面，包括民族生态学研究、从民族药中开发新药研究、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山区扶贫等若干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进展。如西双版纳轮歇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从哈尼族传统草药中开发“爱尼防感油”的研究、云南楚雄紫溪山彝族村社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西双版纳傣族“龙山”恢复与佛教寺院植物重建项目、云南高黎贡山社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云南江城明子山扶贫项目等，均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研究和试点推广成果。

在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协同进化关系方面，我国学者较先证明了传统文化和信仰对植物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的观点，在对傣族“神山”信仰、佛教寺院植物、滇西北民族“圣境”信仰、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等若干方面均进行了具有深刻影响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信仰文化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主张承认传统信仰文化中对保护自然的积极因素，从而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参与自然保护的行动（裴盛基，2003）。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我国民族药的研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由于我国政府一贯实行重视扶持传统医药的政策。在中药得到发扬光大的同时，我国民族药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民族药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些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民族医药研究院所，是我国从事民族植物学相关领域研究的最大专业人员群体。我国民族药调查已取得显著成绩，据统计在全国 11 446 种药用植物中，民族药至少在 8 000 种以上，其中藏药就有 3 600 多种［据《藏药植物》（杨竞生教授主编，正在印刷出版中）］。近年来，从民族药中开发出的各类新药估计有千种之多，如藏药红景天、诺迪康；苗族药灯盏细辛、米槁树、艾纳香、观音草；傣药亚呼噜、灯台叶、肾茶、美登木以及从云南民族药中开发出的排毒养颜胶囊；从

四川民族药中开发出的三勒浆等等。

在短短 20 年里，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整理出版出了若干专门性著作。《中国民族药志》第 1、2、3 卷已经出版；有关蒙、维、藏、苗、傣、彝、哈尼、拉祜、水、壮、土家族等民族药志书出版了不下 40 本。《民族植物学手册》、《应用民族植物学》、《西双版纳轮歇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研究》等 10 余部专著先后出版；在国内外发表了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约在 500 篇以上。我国台湾的民族植物学工作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成果，自上一世纪 90 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有关台湾的民俗植物，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等一批出版物。最近，由两位台湾植物学家潘富俊、吕胜（2002）合编出版了《诗经植物图鉴》，对诗经中记载的 110 种植物进行了名实考证，配以精美图片，是一本很好的古籍植物学信息研究专著。

我国民族植物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1）学科建设不够完善。民族植物学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其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缺乏统一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国外如此，国内亦然。近年来，民族植物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已经初步形成，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可重复性。但总的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学科间的亲和力。

（2）社会认知度不足。民族植物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科学，社会各界，甚至科学界知道的人也不多，由于不够了解，部分人还存疑其学科的地位。由于社会上不了解民族植物学，对其支持和关心的程度也不够，因而出现了研究经费投入不足，重视不够，学术交流较少以及片面认为民族植物学只研究少数民族而不包括汉族的传统知识等许多认识上的问题。

（3）民族植物学的应用有待加强。虽然民族植物学应用于社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民族药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大多只停留在试验示范推广点上，并未形成较大的规模，特别是民族植物学与产业发展的结合方面，还未真正开展起来，今后应大力加强。

2.3　发展趋势展望

民族植物学在我国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领域，自上一个世纪 80 年代初在我国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有关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论文算起，至今仅有 20 年的历史。在过去 20 年里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已经从无到有，从局部地区到西部若干省区，从研究院所到实际应用，从国内走向国际，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民族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中国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巨大的植物多样性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中国民族植物学成长的坚实根基；中国现代发展的坚挺步伐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潮是中国民族植物学发展的强劲动力。民族植物学在我国的发展，再一次证明了历史推动科学的发展，科学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展望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纳为 3 个主要方面：（1）深入调查发掘、记载描述我国各族人民利用植物和保护植物的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2）科学考证我国古籍中的植物学信息，对我国传统使用的各种

植物进行“正本清源”，为进一步利用丰富的古籍植物学信息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3)应用和发展古今民族植物学成果，促进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我国各民族利用植物的历史十分悠久，堪称世界之最。在现已查明的3万种高等植物中，至少有15 000种被我国各族人民所利用，其中药用植物就多达11 146种。植物利用的范围涉及到衣、食、住、药、文化信仰、生态安全等无所不包。我国各族人民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知识宝库，是人类文明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历来都十分重视研究继承和发扬这一丰厚的历史财富，中国古籍中植物学和有关植物信息记述的文献数以千计；我国各族人民利用植物的知识堪称博大精深，这笔巨大的历史财富是中国现代发展和华夏民族再崛起的巨大动力，我们应当倍加珍惜和爱护。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的科学，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人类认识、利用和保护植物的宝贵知识和实践经验积累的历史过程，它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突出的民族性和一定的文化特征。用现代科学方法手段研究民族民间传统利用植物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服务，为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提高作贡献，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根本方向和任务。

民族植物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形成和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历代保存下来的植物学和本草学典籍浩如烟海，是研究民族植物学的巨大历史宝库，公元304年，晋代稽含撰写的《南方草木状》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民族植物志，已有1 700多年的历史，它记述了我国两广、云南和越南的重要植物资源共计80条。民族植物学的近代发展起始于美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民族植物学研究已经遍及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其分支学科也愈来愈多，药用民族植物学、民族森林学、古民族植物学、民族植物分类学、民族生态学等纷纷问世，由于现代工业发展对植物原料的需求越来越广泛，遗传多样性对农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人类医药保健对传统药物的需求日益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消失问题日渐突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性随之日渐突出而高涨。目前民族植物学研究已遍及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其研究内容已从经典的调查编目描述发展到应用于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民族植物学可以而且能够为我国数以万计的植物种类在各民族民间传统利用的悠久历史中，发现和验证它们的科学依据和现代应用价值，为产业发展，特别是正蓬勃兴起的以野生植物原料为依托的产业不断提供新的植物药品、保健品、天然安全的香料化妆品、绿色食品、天然食用色素和染料、植物胶、植物纤维、民族传统植物工艺产品、乡土观赏园艺植物以及特种森林产品、城乡环境保护植物材料等等。因此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全面开展深入调查发掘、科学考证和实际应用这三大方面的研究工作。当前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重建西部秀美山川生态环境，为民族植物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会。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起始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东部地区有先进的技术和智力资源，有较强的资本和投资开发能力，当前应当研究如何把东部的资本智力优势和西部的资源学科优势结合起来，推动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发展东部的经济，取得东西发展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结果。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从经典到应用，从局部到全国，从科研院所到产业化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过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态环

境建设对科学技术的巨大需求，必将进一步推动民族植物学的发展，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盛诚桂，1983. 民族植物学，一门古老而又恢复了青春的植物学分支 [J]. 植物杂志，Vol. 1

谢剑（主编），1982. 中译人类学词汇 [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潘富俊，吕胜由，2002. 诗经植物图鉴 [M]. 台北：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

裴盛基，1985. 民族植物学 [J]. 科学杂志，37（2）

裴盛基，1982.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C]. 热带植物研究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裴盛基，2003. 中国民族植物学：回顾与展望 [J]. 中国医学生物技术应用杂志，2

Cotton CM，1996. Ethnobotany：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M]. John Wiley & Sons，Chichester，UK

Cunningham AB，2001. Applied Ethnobotany：People，Wild Plant Use and Conservation [M]. London：Earthscan

Ford RI，1978.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U. S. A [C]. Anthropological Papers，Museum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Ford RI，2001. Ethnobiology at the Millennium，Past Promise and Future Prospects，Anthropological Papers [R]. Museum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Michigan Number 91

Hamilton AC，Pei SJ，J. Kessy，*et al*，2003. The Purposes and Teaching of Applied Ethnobotany：People and Plants Working Paper，No. 11 [M]. WWF-UNESCO-Royal Botanical Garden Kew

Jain SK，1987. A Manual of Ethnobotany [M]. Jodhpur：Scientific Publishers

Martin G，1995. Ethnobotany：a Methods Manual [M]. London：Champman and Hall

NSF，2003. NSF Biocomplexity Workkshop Report：Intellectual Imperatives in Ethnobiology [M].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USA

Pei SJ（裴盛基），1988. Ethnobotany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J]. *Acta Bot Yunnan*（云南植物研究），增刊Ⅰ：135—144

Posey DA，Dutfield G，1996. Beyond Intellectual Property：Toward Traditional Resource Rights for Indigenous People and Local Communities [R]. IDRC

Pei SJ，2002. Bio-cultural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J].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2）：

UNESCO，2003. The Importance of sacred natural sit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held in Kunming and Xishuangbanna Biosphere Reserv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7—20，February 2003. Volume Edifors：Cathy Lee，Thomas Schaaf. Paris